

思想周刊 / 学习

学习有理

“十五五”：长三角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 权衡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承载区,发挥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动和落实的一项战略任务。

准确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载体,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和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可持续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应该说,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认识和自觉行动。“十五五”时期,要更加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义。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这个基本原理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其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应其发展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其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区域发展来看,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推动某一个区域甚至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向前发展,但是生产关系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差异性、不均衡性等,会影响甚至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了这个区域必然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但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市场体系、大中小企业、上中下产业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性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就决定了长三角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无法按照统一的模式和路径来推进,而是要坚持因地制宜方法论,从三省一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处理好差异化发展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态势,进而快速形成并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大国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分工理论的实践要义。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特别是大国区域发展理论,本质上强调实现区域分工合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强调要高度重视区域发展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诸多要素的适配性,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发展动能。从全国区域整体格局来看,沿海开放地区,依托港口、开放优势和国际产业链网络,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快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知识密集型以及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开放型新兴产业;内陆地区应更多依托能源资源及产业配套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和布局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化工等实体型新兴产业。从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上海科教教育发达,江苏实体经济和产业基础好,浙江民营资本和科技市场活力强,安徽在新技术方面有后发优势。这就要求把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机结合,为区域协作共赢提供新思路。

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具有十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依据和科学的方法论,也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实践路径。“十五五”时期,我们只有坚持做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更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生产力布局,避免“一哄而上”的同质化竞争、甚至恶性内卷的落后生产关系,才能找到各自创新的“突破口”和“主赛道”,激活各自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将各地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将地方优势与国家需求对接,形成“国家所需、地方所能”的良性互动。

第三,要积极推动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设立世界颠覆性前沿科技研究项目或重大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面向全球招募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给予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和国际一流的研究条件,共同培育全球科技创新“核爆点”,抢占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

第三,着力优化未来产业新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十五五”时期,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这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其中,以硬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牵引力量和动力来源。培育未来产业,对于长三角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均出台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相应指导意见或行动方案,纷纷提出了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脑机接口、新材料、未来网络等多个领域的未来产业发展设想,但从最大程度发挥长三角整体优势的要求来看,不免存在一定的重复建设与同质竞争问题。因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

长三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升长三角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级和水平。“十五五”时期,长三角地区要紧抓差异化、协同化的重大科技任务布局,加快要素跨区域流动和资源配置跨区域政策协调,联合制定长三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坚持优势互补,突出分工合作,明晰各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突破口及多方合作方向,形成长三角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最大程度地形成并释放动力源。

第二,要积极构建跨区域协同研发创新机制,联合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十五五”时期,要结合长三角“科教资源密集、产业协同基础好、开放程度高”的特点,加大跨区域协同创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多元主体联动攻关、开放合作深化等路径,系统性提升基础研发能力,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一是出台长三角基础研究协同发展相关规划,明确各省市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定位,如上海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合肥聚焦量子科技、核聚变、集成电路材料,南京聚焦人工智能基础算法,杭州聚焦数字经济和大模型等底层架构等,各自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避免重复投入、分散竞争。二是共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座支撑。继续深化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改革,支持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计划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推动建立设施开放共享应用机制,打造“布局合理、功能互补、开放共享”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的全链条支撑。同时,要协同实施大模型、数据、算力基础性工程建设,推进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建设,在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慧康复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场景和项目。三是围绕全球颠覆性重大科学难题,吸引全球科学家力量,开展联合攻关研究。探索新型举国科创体制的区域实践,三省一市联合设立世界颠覆性前沿科技研究项目或重大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面向全球招募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给予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和国际一流的研究条件,共同培育全球科技创新“核爆点”,抢占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

第三,着力优化未来产业新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十五五”时期,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这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其中,以硬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牵引力量和动力来源。培育未来产业,对于长三角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均出台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相应指导意见或行动方案,纷纷提出了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脑机接口、新材料、未来网络等多个领域的未来产业发展设想,但从最大程度发挥长三角整体优势的要求来看,不免存在一定的重复建设与同质竞争问题。因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

中,三省一市要从长三角整体利益出发,紧紧扣住未来产业这个牛鼻子,协同调整、不断优化全域未来产业布局,更加突出市场导向和潜在优势,聚焦新产业、开辟新赛道、积累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切实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打造分工合作、高效联动、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长三角未来产业集群。

第四,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助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知识驱动的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度依赖区域创新生态的培育。以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十五五”时期长三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一是构建区域和全球创新成果转化网络。一方面,要共同打造长三角技术转移中介市场,扶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等科技服务和转化中介平台发展,实现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无缝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转移转化。另一方面,依托上海技术交易所、浙江科技大市场等平台,建立“基础研究成果—全球技术交易—产业转化”通道,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跨境流动与产业化。二是建立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组建长三角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设置概念验证基金,对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前沿基础研究、新兴产业技术项目、共建孵化器和产业基地进行联合投资。联合推动财税改革,探索建立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和“投入共担收入共享”的财税分享机制。三是加大区域科技政策协同,营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长三角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区域实现互认互通,增强政策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创新型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研发创新基地等方面资质互认。四是实质性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跨省市贯通。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双聘人员和用人单位考核激励机制。破解人才跨界流动的瓶颈制约,推行人才“柔性流动”政策,实施院校企高层次人才区域“互聘共享”计划,允许科研人员在不改变人事关系的前提下,跨省市参与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试点“科研签证”制度,为国外高端人才在长三角跨区域开展研究提供便利。统一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利转化收益分享等政策,形成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统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激发人才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理论铸魂·我在之江学新语

■ 代玉启

《礼记·中庸》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深刻揭示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在于独处时的自我约束。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对“慎独”这一传统修身理念的阐释尤为精微,既反复申明其理,更在《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一文中明确了其崇高境界的定位,为人们的身心修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镜鉴。

慎独,是指在独处的境遇中,依然能够持守道德准则,保持内心澄明与行为端正。这是一种高度自律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种深层次的自我修养。

“小事当慎,小节当拘”。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传统认知,常使人忽视细微之处的力量。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小事当慎,小节当拘”,揭示了欲成其大、必谨于微的道理。《之江新语》中《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一文有言:“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慎独慎微,在日常点滴中加强自身修养,从学习思考中明辨是非曲直,在反躬自省中提升思想境界,依靠道德修养恪守节操品行,秉持浩然正气抵御腐败侵蚀,方能永葆初心本色,成就事业宏图。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用思想武器管好自己》《要干事,更要“干净”》《追求“慎独”的高境界》等篇目之中,习近平同志多次对广大领导干部提出“四自”要求。自重彰显人格尊严,是立身之本;自省照见不足,是进步之阶;自警未雨绸缪,是清醒之要;自励催人奋进,是动力之源。这些要求共同构筑起修身养德的坚实防线,指引我们在纷繁环境中不妄取、不苟为,在人生道路上行得正、走得稳。

“响鼓不用重锤敲”。真正具备思想觉悟和道德定力的人,无需外界严苛督促,便能自觉坚守准则。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将严于律己视为修身正己的基本准则。那么当以何为律己之纲?“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用思想武器管好自己”即是最好的回答。依托人格魅力涵养德行,能让自律成为一种内在自觉;以思想武器筑牢根基,可为精神世界筑起坚固屏障。内外兼修之下,方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慎独始终是贯穿时空的修身命题。慎独,源自儒家伦理土壤,《之江新语》结合现代实践,赋予慎独新的时代内涵。二者看似时空远隔,却在叩问本心、坚守自律的精神内核中完成了跨越千年的对话。

慎独之道。慎独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智慧的结晶,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内在自律的重视,也彰显了儒家“诚于中,形于外”的修身要义。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慎独并非简单的行为规范,而是被视为修身养德的最高境界,道破独处时最见真章的人生哲理。也就是说,当外在监督暂时缺位时,一个人能否依然保持言行与信念的高度统一,恰是检验其道德修为的终极标尺。

慎独之思。在当今社会,慎独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更成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准则、社会诚信建设的根基。习近平同志在《激浊扬清正字当头》中如是说:“如果失去律己之心,随波逐流,趋利媚俗,放纵自己,就会混淆是非,走上邪路,使国家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这一论述将“慎独”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慎独”是抵御诱惑的思想防线,也是实现社会生态海晏河清的重要途径。

慎独之益。“慎独”,拆解开来是“独处时的审慎”,如明镜,照见真实的自我;似基石,撑起人格的高度。当一个人在独处时仍能恪守准则,便拥有了超越环境的精神定力。东汉杨震拒金以“天知地知”自警,让他在无人监督时守住清廉;北宋司马光“步履履矩”的自律,使他于独处中亦不松懈。在价值多元的当今时代,慎独能够助我们抵御物欲的诱惑,在精神层面保持高度的自我觉知,“时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逊态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如何让慎独从道德理想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底色?

以学养德,在读书学习中涵养慎独品格。当我们在书页间辨析真理与谬误,实则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让慎独从抽象概念转化为行为自觉的关键。每一次深入阅读都是对自我认知的校准,对道德防线的加固。《多读书,修政德》中提出,“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读书学习始终是涵养慎独品格的重要途径,让文字中的道德智慧沉淀为血液里的自律基因,才能在无人监督时依然保持“怀德自重”的清醒。

以戒修身,在戒骄戒躁中锤炼慎独定力。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做人做事要力戒浮躁”的要求与期望,以“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凝”点明了浮躁对慎独的侵蚀。浮躁表面看是情绪波动,实则是不良作风的隐患。要根治这一顽疾,根本在于坚守“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操守。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戒除浮躁都是修身养性的关键。《顺利时更应防浮躁》一文强调,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在安逸中守住慎独的底线。“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戒”为盾的修身之道,正是锤炼慎独定力的关键。

以微见著,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达成慎独境界。从《敬业乐业为美德》一文中“着眼大局,立足小事”的理念,到《求知善读,贵耳重目》一文中“在耳闻、目见、足践之中见微知著、管窥全豹”的论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对于慎独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践行的辩证统一。慎独境界的达成,既需“精其术”的专注,在细节处精益求精;也需“竭其力”的坚持,于平凡中沉淀心性。当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照搬经验、务求卓越,在待人接物时于细微处守原则、讲风格,便是在“致广大”的格局中践行“尽精微”的慎独。这种于毫末处见真章的自律,正是慎独境界从认知到实践的生动转化。

“君子慎独,不欺暗室。”慎独,是千年的修身箴言,亦是当下的精神坐标。正如明珠暗投而不显其光,慎独者即便在无人见证的场合,也能展现出高度自律的精神品格。从《之江新语》的谆谆告诫中,我们读懂了慎独既是对内心的敬畏,也是对行动的指引。真正的修养,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而在独处时的慎终始如;真正的践行,不在豪言壮语之中,而在日常里的知行合一。当慎独成为习惯,它便不再是约束,而是让我们在纷繁世界里守住本心。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重要论述摘编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始如,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上的讲话

党员、干部要筑牢思想防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从《之江新语》读懂『慎独』的力量

社科论衡

“两个结合”的历史自觉与中华文化主体性

■ 王绪琴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串联起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复兴图强的奋斗历程,见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复兴的进程。

“第一个结合”与中国近现代转型发展的探索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核心命题,国内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仁人志士开始了各种探索与尝试。

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朝廷中的开明派掀起了洋务运动,试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现代化。但这种器物层面革新的失败,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制度革新。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制实现政治现代化。但这场改革仅持续了103天,揭示了在守旧势力根深蒂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举步维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试图以西方共和制重构中国政治。不过,这场革命很快陷入实践困境,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

鉴于以上尝试均未取得成功,人们

开始意识到,思想与观念层面的改变才是根本。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在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僵化运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挫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结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一个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晰透彻,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直至20世纪70、80年代之交,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我们才逐步探索出一条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并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可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大胆进行“第一个结合”的实践,引领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既是

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文明在危机中寻求新生的历史自觉。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近代中国社会经历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空前危机。当中国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经济上融入全球时,中国增强文化自信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刻回应。在阐述“第二个结合”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缺少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就找不到自身的精神坐标,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同志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这既是对中华文明精神血脉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刻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图谱中的独特标识。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百年探索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经验总结,是对中华民族在当前“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该当何去何从的深刻回答。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第二个结合”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魂魄,又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引领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华文化的号召力相辅相成。《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的软实力排名从去年的第三上升至第二。

“第二个结合”是一个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论断。“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将文明的发展史简化为非此即彼的线性路径,而“第二个结合”以文明交流互鉴、融合贯通的辩证法打破了这种认知桎梏。人类文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色彩斑斓的调色盘,每种文明都在独特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出专属的精神标识与制度智慧;制度的多元性更像是不同土壤中长生的参天大树,只要扎根于本国历史文化、契合人民根本利益,就能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绽放生机。当“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我们由此坚信,终结“古今中西”之争的途径,不是消解文明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多元的基础上构建文明互鉴的新范式;让每种文明都在自身轨道上蓬勃发展,又能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中相映成辉,共同勾勒出文明进步的壮阔图景。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